

直道而行

张岱年◎著

上

青年读本

黄方迪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直道

の行

青木十次郎

東京 青木書店



青年读本

直道而行

张岱年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道而行/张岱年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0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921—4

I. 直…

II. 张…

III. 社会科学—随笔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515 号

直道而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13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921—4/C·29

定 价:59.8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目 录

我与中国 20 世纪	1
------------------	---

记人篇

论胡适之

——关于胡适之的一些感想	29
陈寅恪先生关于思想史的卓识	32
怀念汤用彤先生	34
忆熊十力先生	37
忆金岳霖先生	41
悼念梁漱溟先生	45
怀念老友虞愚同志	47
怀念老友张恒寿同志 ..	48
悼念陈元晖同志	50
怀念哲学界的老友	51
忆旧说梦	54
祝贺金景芳先生九五寿辰	56

思亲篇

哲人其萎 遗范永存	
——沉痛悼念冯友兰先生	61
悼念冯友兰先生	67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	70
论冯友兰哲学思想的转变	77
冯友兰先生二三事	81
怀念冯友兰先生	84
回忆张申府	87
学识渊博 风范长存	
——悼念张申府同志	90
张申府的哲学思想	93

叙事篇

记忆中的第一次	101
回忆在师大附中读书时	103
回忆 50 年代初期的北面哲学系	105
回忆清华哲学系	108
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115
北京图书馆八十周年有感	117
研习哲学过程杂忆	119

人生篇

谈士节	125
生命与道德	127
研思札记	133
哲苑絮语	155
礼义与人心	159
人伦与独立人格	161
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	170
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	176
追求真理 振兴中华	184
对于 21 世纪的希冀	186

治学篇

我的哲学观	191
怎样学习中国哲学史	193
谈中国哲学史的学习方法	196
谈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	201
读书札记	207
我喜读的十本书	211
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如何步入中国哲学的殿堂	213

说“国学”	215
述与作	218
漫谈正名	220
疑古与信古	223
辨程门立雪	225
修辞立其诚	227
文化的综合与创新	230
历史文献研究的重要意义	233
整理伦理学说史料的方法	235
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新综合哲学要旨	244
《中国哲学大纲》新序	
——对于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批判	258

文史哲漫笔

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	273
义理·考据·词章	277
“百家争鸣”与“定于一尊”	280
“愚民”和“明民”	283
说杨墨	285
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288
儒道之间	292
学派的消长	294

三事与诸子	296
“从理杀人”与“以理抗势”	298
从“孟”、“庄”看学派论争	300
庄惠濠梁之辩	302
评“三不足”	304
评“内圣外王”	307
子贡货殖与既富且仁	310
儒家学说与新的世纪	312
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	316
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展示	
——评介《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	328
文史哲的珍贵文献	
——喜见《张荫麟文集》出版	331
北大百年	333
天爵与良贵	335
思想史上的曲折	338
八十自述	341

附录

冯友兰 “直道而行”	407
宋璞 刚毅木讷近仁	
——记张岱年先生	410

我与中国 20 世纪

20 世纪是中国由衰转盛、由弱转强的大转变世纪。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爱国人民、有志之士，奋起抗敌，力图革新。到 20 世纪初，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民国。但是旧势力旧风习依然难改。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揭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提出了改旧图新的主要纲领。“五四”爱国运动更起了振聋启聩的伟大作用。这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逐渐流传开来，掌握了群众。诚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60 页）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 1949 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之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更显示了伟大力量。中国受外人欺侮的时代过去了。

我生于 1909 年，幼年童蒙时期，对于世事无所闻知；在初中读书时，开始有志于学，而我的学术生命可以说始于 1931 年，时年 22 岁。1936 年撰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大纲》，当时 27 岁。1942 年至 1948 年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及《天人简论》，确定了自己的思想要领，当时年近四十，可以说“四十而不惑”。新中国建立，我躬逢盛世，心情振奋。而 1957 年之后却遭遇到曲折的命运。到 1979 年，我年届七十，又重新焕发了学术的青春。现在虽已达耄耋之年，仍愿继续前进。

一、家庭和幼年求学时期

我于1909年5月生于北京，三岁时随母回家乡居住，老家在河北省献县。幼年是在家乡中度过的。（老家所在的村庄，解放后划归沧县。）

父亲名濂，字众清，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曾任众议院议员。晚年在北京闲居，喜“黄老”之学。母亲赵太夫人，生三子二女。我的长兄崧年，字申府，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1932年至1936年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二兄崇年，任河北大学物理系教授。

我六七岁时在家乡私塾中读《四书》，母亲病逝之后随父来到北京，入北京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时期，我一个小学生对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却无所闻知。一位国文教师给我们印发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我读了也不甚理解。国文课本中有一篇《达尔文传》，我读了却很感兴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两句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1923年我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时，开始有志于学，对于史学、哲学都很感兴趣。当时国势危急，天津上海等地都有外国的租界，显示了国家的屈辱。每年五月七日定为国耻节，青年学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师生都怀抱一定的爱国激情。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附中主任（实即校长）林励儒先生为全校师生作了一次学术讲演，讲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林先生强调康德所讲“要把任何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工具”，这是康德的一大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我听了非常感动，给我以深刻的现象。

高中一年级时，班主任汪震先生开了“中国哲学史”

课程，我很感兴趣。汪师兼通文学、哲学、心理学，对于美国詹姆士哲学研究较深。汪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老兄张申府是现在中国哲学界新实在论的代表。”这时我才对于吾兄申府的学识有所了解。

当时的时代任务有二，一是民族解放，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二是社会改造，即反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意识。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投入革命的洪流。我也曾经有参加革命活动的愿望，但生性比较迟缓，自审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二、30年代至40年代的学术研究

1928年秋，我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其后几年间，我虽在师大听课，而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一方面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一方面阅读西方哲学英文原著。幼年时读《论语》、《孟子》，只是诵读而已，并不了解其中意蕴。后来读了周敦颐的《通书》，读到“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又“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深受启发，开始对于孔孟的精粹思想有所理解。我喜读《老》、《庄》，对于老庄的自然主义颇为钦佩，但不赞成老庄的消极的生活态度。我深佩墨子“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救世精神，但自愧难以做到。关于中国哲学史，我读过梁任公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很感兴趣，但又不满足。1931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考察之精，论证之细，使我深深敬佩！我本来对于老子年代问题有兴趣，在冯著上卷的影响之下，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报·文学副刊》，承编者嘉

许，发表出来。此文认为《老子》书当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后被选入《古史辨》第四册中。（后来到50年代，我重新考虑老子年代问题，我同意郭沫若的观点，肯定孔老同时的旧说。）

关于西方哲学，在吾兄申府的引导之下，我细心钻研了英国新实在论的哲学，最喜读罗素（B. Russell）、穆尔（C. E. Moore）、怀特海（A. N. Whitehead）、博若德（C. D. Broad）的著作，对于此派的逻辑分析（Logical analysis）方法甚为赞赏。也读过西方唯心论及实用主义的书，则不能契入。

20年代末30年初，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译籍比较流行，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也是在吾兄申府的引导之下，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我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译本。又阅读了李达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深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折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

1932年吾兄申府主编《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副刊，使我有机会发表一些长短不同的学术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是为我参加学术论坛的开始。

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有：（1）《论外界的实在》，（2）《谭理》，（3）《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4）《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5）《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6）《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7）《辩证法与生活》，（8）《中国思想源流》等等。

《论外界的实在》以理论分析的方法论证外在世界（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反驳佛家的“唯心唯识”、西方的主观唯心论以及陆王学派“心外无物”之说。

《谭理》分析了共相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论证“理在事

中”。

《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体系。

《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表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基本观点。

《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与《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论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思维的主要内容，其中阐释《老子》、《易传》及张载、王夫之的辩证法较详。在此之前，尚无论述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的专文，这两篇是论述中国哲学中辩证思想的开始。

《辩证法与生活》提出在实际生活中应该运用辩证法，认为生活是充满了矛盾的，辩证法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所以辩证法是生活的指针。

《中国思想源流》论述了儒、墨、道、佛以及宋明理学与清代反理学思潮的演变过程，并提出了对于新时代哲学的展望。此文的结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是采取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此结语实亦表述了个人的志愿和想望。

以上是我1932年至1934年发表的文章的主要内容。

由吾兄申府介绍，我认识了哲学界前辈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向他们请教有关哲学的问题。

1933年，我在师范大学补足了学分，可以毕业了，写了毕业论文，题目是《怀悌黑的教育哲学》，导师是邱椿先生。（怀悌黑是吾兄申府的译法，一般译作怀特海。）因为当时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于是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这是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的。

秋季开学，让我讲授“哲学概论”课程。吾兄申府决定，让我用 D. S. Rabinson 的 An Introduction to Living Philosophy 作为课本。书中内容分（1）导论，（2）唯心论，（3）实在论，（4）实用主义，（5）其他派别。主要是按类型来讲的。我讲课时增加了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的材料，并且较详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

在清华大学任教，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是与张荫麟先生定交。荫麟字素痴，对于哲学、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造诣，他赴美到斯丹福大学留学，1933 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他虚怀若谷，看到我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的文章，表示赞同，遂成挚友。他时相过访，议论相近。（后来到抗战时期，荫麟先生不幸在南方逝世，年寿不永，实为学术界一大损失。）

我到清华任教之次年，遭遇家庭大故，父亲患病不愈，于 1934 年 3 月 4 日逝世，家里一阵慌乱。父亲身体素健，春节后得疾，不意转剧，遽尔弃世。父亲晚岁长于书法，崇尚颜体，刚劲有力，尝刻一图章云“留心翰墨近四十年”。经常为人写条幅，近年已很少留存了。

30 年代，我关心中国哲学之前途的问题，1935 年我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提出了我对于未来中国哲学的见解。我以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最少须满足如下的四个条件：（1）能融合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方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3）能创发一个新的贯穿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方哲学系统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适应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应具有如下的性征：（1）在一意

谓上是唯物的；(2)在一意谓上是理想的；(3)是辩证的；(4)是批评的。此文强调了唯物论的重要，而又讲未来哲学既是唯物的又是理想的，其意认为所谓唯物主要是本体论与认识论方面的观点，并不涵蕴关于人生理想的学说，所以又提出“理想的”，意在将唯物论与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所谓批评的，意即分析的。20世纪初年，英国哲学家 C. D. Broad 分哲学为二种，一为妄想哲学 (speculative philosophy)，二为批评哲学 (critical philosophy)。所谓批评即分析之义。穆尔与罗素强调逻辑分析方法，其所谓逻辑指形式逻辑。我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是相辅相成的，应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30年代中期，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我也不甘落后，于是写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试图提出自己关于哲学问题的系统观点，发表于《国闻周报》。我大胆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文章赞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而认为中国哲学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近二三十年来解析派哲学有大的发展，应容纳解析派之贡献。认为，所谓唯物乃谓物质是最基本的，为生命与心知之所从出；物为心、生、理之本，而无先于物者。解析法之要义在于辩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削减含忽。中国近三百年有创造性贡献的哲学家如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都倾向于唯物论，现代我们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以提高，扩展。

这篇文章提出“将唯物、理想与解析综合于一”，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综合，一方面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另一方面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吾兄申府曾提出

“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即将列宁的唯物辩证法与罗素的逻辑解析法与孔子的仁的学说会综合起来。我颇受启发。但我认为，关于中国哲学，不但应重视孔子，也应重视道家和墨家的贡献，而更应发扬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进步思想。

此文发表之后，收到上海苏渊雷同志的来信，表示赞同，我十分高兴！（苏渊雷同志此信后来收入所著《中国思想文化论稿》）但此外没有更多的反响。文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解释未必能得到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同志们的同意，更不为唯心论者所喜，而且文章用了不通俗的名词如将辩证法称为“对理法”、将对立统一称为两一等等，也是不能引起多人注意的原因。

1936年，冯友兰先生、汤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等在北平发起组织“中国哲学会”，召开了中国哲学会的第一次讨论会。冯友兰先生鼓励我提交一篇论文，于是我写了《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一文。这篇文章提出关于人生理想的四个基本观点：（1）理生合一，（2）与群为一，（3）义命合一，（4）动的天人合一。认为：在人生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可以说是生与理的问题。生即生活、生命；理即道德准则。古代哲学所谓义利、理欲等问题其实是理与生的问题。儒家强调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其实义与利、理与欲是统一的。其次，以前的哲学家喜讲“与天为一”，未免失之玄虚；实则生活上应与之合一的应是人群、是社会国家，应努力于“与群为一”。“义命合一”是借用张横渠的文句，认为应当肯定道德准则与客观的必然规律的对立统一。所谓动的天人合一是对静的天人合一而言。静的天人合一指古代道家、儒家“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境界。动的天人合一是以行动调整自然以达到天人的和谐。这篇文章虽有一些新意，但写得不通俗，而且用了一些古旧的名词，令